

Translation Forum

翻译苑

广西翻译协会组织编写

黄建华 / 主编

刘上扶 / 审定

广西教育出版社

翻译 文苑

广西翻译协会组织编写

黄建伟/主编 刘映华/副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文苑 / 黄建华主编.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6. 7**
ISBN 7-5435-4583-7

I. 翻... II. 黄... III. 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73514号

翻译文苑

黄建华 主编

刘上扶 审定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0771-5865797

邮购电话: 0771-5852408

读者电子信箱 gxjycbs@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09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5-4583-7/G·3627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本书书稿的征集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共收集了60余篇论文和评析，内容涉及翻译理论与研究、文学翻译与评析、科技英语翻译、商务英语翻译、广告英语翻译、机译探讨和翻译实践。这些文章全部是广西翻译协会会员的科研结晶。他们是在各条战线从事口头、笔头翻译的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担任翻译教学的教师，以及热爱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广西翻译协会会员。他们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及翻译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翻译理论探讨和翻译实践可以起到很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由广西翻译协会组织编写，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黄建华副教授担任主编，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上扶教授担任审定。广西翻译界的老前辈和资深教授、专家们在百忙中审读了书中的作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广西外语界的老前辈——贺祥麟教授对本书的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并热情地给本书写了序言。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6年8月5日



序 言

翻译是一门重要学问，也是一项伟大事业。作为学问来说，我从来都认为，一个翻译家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即本国语文知识和技能、外国语言知识和技能、需要进行翻译的某种专业知识，以及比较广博的综合文化背景知识。这四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作为事业来说，翻译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伟大的作用。试看汉朝和唐朝时代，佛经翻译对我国文化影响之大，就不难理解其重要性。更不用说处于今天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无论中外文化教育和科技交流、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以至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等，哪一样能离得开翻译？是否可以这样说，翻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重要，正如空气和水之于人一样不可缺少。由此可见，翻译之作用大矣哉！

有翻译，就必然有翻译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翻译理论为翻译服务。它探讨翻译问题，研究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作品，既指导翻译又服务于翻译。翻译理论工作者与翻译家是亲密兄弟和好友。包括翻译理论在内的我国的翻译事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但成立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各种翻译组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广西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更名为“广西翻译协会”，以下简称广西译协）成立于1984年，至今已有22年。尽管与全国其他省（区）的先进协会相比，它还只是一个小兄弟，但是这些年来它一直在茁壮成长。特别是自从2004年9月广西换届选举以后，新的一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广西译协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努力团结全体会员，组织各项学术活动，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2005年10月底，广西译协在南宁召开“泛珠三角翻译研讨会”，全国许多省市著名翻译家和学者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会，共同探讨翻译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对会议评价很高，认为这次会议对国内翻译界影响重大，值得赞扬。同样可喜可贺的是，广西译协近年来组织会员著书立说、进行翻译论文写作，《翻译文苑》作为它的第一个成果终于跟读者见面了。

这部《翻译文苑》共收集翻译论文60余篇，其内容涉及翻译理论与研究、文学翻译与评析、科技英语翻译、商务英语翻译、广告英语翻

译、机译探讨和翻译实践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自从1950年回国至今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广西几所高等院校从事外语和汉语教学，几十年来目睹广西外语教学和翻译事业不断成长壮大、人才辈出，欢悦之情难以言表。值此《翻译文苑》问世之际，谨作序言，为此书之出版贺喜，也为广西译协和广西整个翻译界贺喜。祝广西和全国的翻译事业兴旺发达，如日之恒！

贺祥麟

2006年6月16日于邕江之滨

目 录

一、翻译理论研究

- 文学翻译今昔谈……………贺祥麟 (1)
- 对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异同的比较……………郑锐致 (10)
- 以语体为视点的翻译方法的理论基础……………江 帆 (14)
-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的新视角……………韦晓萍 王锡芬 (21)
- 浅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进性
- 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相比较……………李丽晓 (29)
- 从一个新视角看多元系统论……………何 琴 (33)
- 论近代翻译文学对中文小说的影响……………费守丽 (37)
-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归化与异化……………许 明 (43)
- 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梁俊超 (47)
- 翻译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 从日本吸收中国文化角度分析
- ……………田丽恒 乔莹洁 黄成湘 (51)
- 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学翻译……………阮茉莉 (56)
- 以《傲慢与偏见》两个译本为例, 浅谈翻译中文体风格
- 的再现……………冯炜霞 (61)
- 语用前提的不对称与翻译补偿策略
- 《红楼梦》英译本中补偿策略的译例分析……………周玉玲 (66)
- 动态等值理论与广告翻译……………谢智乐 (71)
- 翻译等值探讨……………夏红英 (75)
- 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的灵魂……………石 文 (80)

二、文学翻译与评析

- 论许渊冲译毛泽东诗词的“三美”……………冯 艳 (83)
- 细微之处现风格
- 《鲁滨孙飘流记》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和评析
- ……………庞文慧 (88)

新老风格各取所长

- 两个《还乡》译本的比较……………张颖莹 (95)
- 试析《远大前程》的两种译文……………何丽玲 (100)
- 文学翻译中的契合小议……………刘淑杰 (106)
- 赏析杨氏夫妇的译作《祝福》……………蒋戴丽 (110)
- 对《马丁·伊登》殷惟本中译本的评析……………韦兵顶 (115)
- Annabel Lee* 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赏析……………李 佳 (120)
- 不完美的人性
- 《红字》三位主人公的思考……………陈淑芳 (124)
- 《夜雨寄北》的不同版本的赏析
- 兼谈诗歌翻译的矛盾……………李 雪 (129)
- 从《爱玛》的译本看“信”的标准……………祝 捷 (134)
- 从伍尔芙《论简·奥斯汀》的一段译文看意境的翻译
- ……………蓝 岚 (139)
- 《红字》两种中译本的比较分析……………骆曼莉 (143)
- 《约翰的归来》翻译赏析……………莫忠宙 黄海燕 (147)
- 马克·吐温《田纳西的新闻界》翻译比较赏析
- ……………赵利中 (151)
- 《傲慢与偏见》译本赏析……………姜宜敏 (157)
- 由译文赏析联想到英文诗歌创作……………李爱茹 (163)
- 《红楼梦》英译中体现的对文化空白的翻译策略
- ……………程 虎 (168)
- 《关雎》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陈蓁文 (172)
- 《苔丝》两种译文比较……………李 明 (178)
- 《论语》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王 芳 (182)
- 浅谈 *A Psalm of Life* 三个中译本中的文化因素
- ……………江晓雯 (187)
- 《荒原》的理解与译文赏析……………谢彩云 (191)
- 浅谈《圣经》注释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
- 《德伯家的苔丝》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韦 维 (196)
- 美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 华兹华斯《孤独的割麦女》的欣赏和译文比较

.....	朱彩云 (201)
从 <i>In the Moonlight</i> 的两种诗译看翻译的时代性	
.....	李柳媛 (209)
《三国演义》罗译本中文化内容翻译的评析	
.....	骆 桦 (215)

三、科技英语翻译

浅谈科技英语翻译中的“雅”	
——修辞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苏虎典 (220)
浅谈英语科技术语的翻译.....	周 婷 (225)
汉越科技对译的困难及对策.....	蔡 杰 (230)

四、商务英语翻译

从商标的构成谈商标的翻译.....	王雪琴 (234)
文化差异与商标词的翻译.....	费守丽 (240)
商品和广告英语翻译漫谈.....	纪 琳 (246)
外贸函电惯用语的应用与翻译.....	何 浏 (250)

五、广告英语翻译

三种实用的广告汉译英技巧初探.....	陈碧兰 (255)
广告英语的特点和翻译.....	李 媛 (261)
论广告英语中双关语的应用及翻译.....	苏全彩 (266)
浅议广告翻译的词汇特点.....	刘 萍 (270)

六、机译探讨

从“敌乎? Friend 乎?”看文言文机译.....	陈雅灵 (274)
-----------------------------	-----------

七、翻译实践

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解决方法.....	姚 雷 (278)
关于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的探讨.....	王欣欣 (282)
英汉误译原因分析.....	唐艳珊 (287)
从词汇的角度谈口译.....	王雪琴 (291)

英汉语篇语义接应的差异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

.....李 熙 (296)

政论汉英翻译策略浅谈.....黎 敏 (300)

英文报纸文体的特点.....梁保丹 (304)

会展英语术语集锦.....胡少斐 (309)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日本文学翻译中的读者角色和作者角色.....李 伟 (311)

从《雪国》的几个例子看日中英三语互译时的主语省略

.....邓 园 (315)

浅析日译汉中的长句拆分

——以《今昔物语集》的翻译为例.....梁丽娟 (321)

浅谈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熊 飞 (326)

浅论中文人文杂志中的标题翻译.....蒙晓霞 (330)

一、翻译理论研究

文学翻译今昔谈

贺祥麟

回顾历史，我国近代的文学翻译始于清末的严复、林纾和苏曼殊等人。真正第一次大放光彩的时期，则是在五四运动(1919年)至抗日战争(1937年)开始时，而高潮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以鲁迅、曹靖华等人为首的一批优秀文学家、学者和翻译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筚路蓝缕，翻译苏俄、东欧等的文学作品；另外还有一大批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等造诣很高的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也大量介绍了西欧、北美和东方国家的重要作品。广西的马君武更是两线作战，左右开弓，既翻译了一些数学书籍和达尔文的著作，也以典雅的文言文按照旧体诗格式译介了拜伦和席勒的诗歌。诗人梁宗岱十分精彩地翻译了法国象征主义大师保罗·凡乐希的长诗《水仙辞》。

由于日寇的侵略，八年的抗战，致使我国翻译事业受到很大挫折。即使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翻译家们仍在努力工作，一些译作也仍在勉强出版。如朱生豪，这个青年翻译家在抗战前和抗战中，或利用自己任编辑工作之余，或在病榻上，十年寒窗，译出了莎剧三十一部半，最后病逝于浙江嘉兴，年仅32岁。当时，在“大后方”，广西作家秦似翻译出版了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拼命搜刮民财，加上以后又发动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傅雷仍然出版了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轰动一时，影响甚大。我国翻译界前辈这种顽强奋斗以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学习榜样。

我国文学翻译的巨大发展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两个时期：一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二是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期又有不同。前一时期，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苏俄文学和西方古典名著，而对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作品(例如西方现代派作品)则不出。甚至对同为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的五大诗人，也只强调被称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雪莱和济慈的作品，而对所谓“消极

浪漫主义”诗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祖师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诗作则不屑一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且使文学翻译和出版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翻译作品像钱塘江之潮汹涌澎湃，波涛万顷，气势雄浑，万马奔腾。而在“四人帮”长期禁锢思想、封锁书籍十年之后，读者一被解放出来，便出现了读书热和“抢”书狂，抢购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通夜排队，“走后门”，如醉如狂。单是这十几年中，我们先后出版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将近二十位文学大师的全集、多卷本文集或选集。同时，还出版了好几种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人型丛书，包括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过去长期被列为“禁书”的各种现代派作品也都大量被翻译出版，形成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一片繁荣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广西的漓江出版社脱颖而出，以它大量而优秀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作，一跃成为全国最有名的三家文学翻译出版社之一，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鼎足而立，为我国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有所不同，文学翻译和出版界出现了“低谷”甚至“危机”。当然，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基本上仍能保持一定的势头，而且豪华本越出越多，有些精装的、价钱很高的世界文学名著甚至成为新婚男女家庭里的装饰品。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加入了世界版权组织，不能再随便出版外国在世的作家或逝世不足50年的作家的作品，也由于现代派作品逐渐在我国读者中失宠，以及当前翻译界一些人的粗制滥造和水平低下，还有社会风气的影响等各种原因，文学翻译出版的衰退现象十分严重。出书少，精品更少，读者数量也大大减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因此想要改变它并不容易，而且必须长期进行“综合治理”，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单靠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即使是同一原著，因译者不同，译文也不大一样。尽管如此，不同时代的翻译仍然各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和着眼点。清末民初，我国的译界泰斗如严复、林琴南（即林纾）的翻译，用的都是文言文。前者的中、英文造诣都很高，因此他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文笔畅达典雅，若天马行空，来去自由，羚羊挂角，不着痕迹。而林氏则又不

同，他完全不懂外文，全靠由别人（如魏易、王寿昌、王庆骥等人）口译，他边听边写，立即成文。这样难免有不尽忠实于原文之处，加上他对外国社会了解不够，译文中的缺点是明显的。但林纾也有明显的优势：他是清末桐城派散文大师，是大文章家，乃使他善于领会原作者风格，译笔不仅文字流畅，且极富文采，能传原著之神。唯其如此，林译之众多小说乃能自成一体，至今仍有其鲜活的生命力。林氏译文是第一流的文言文，言简意赅，才气横溢。几十年来，我都把读林译小说作为人生一大乐事。前几年，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曾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应该请林琴南先生出山（指‘道山’），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曾说“译才并出数严林”，可见世人对严、林二人评价之高。

中华民国成立后，逐渐有了白话文译文，而且白话文终于成了翻译的主流。白话文译者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有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的周瘦鹃，以及伍氏父子伍光建、伍蠡甫等人。这些人译作的共同特点是文笔浅湿易懂，缺点则是文采稍嫌不足。真正称得起大翻译家、文笔非常典雅畅达的，还是后来的傅雷、朱生豪等人。这两人的译文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但是，若从对原文的忠实和工作态度之极端认真来说，则傅又胜朱一筹。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边译边改，译了又改，甚至排好了版还要不断地改，再版的书他每次都要修改。这种绝对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是我国所有译者的榜样。

若把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清末民初的译著）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译文的质量相比，我认为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译文质量高得多。这首先体现在忠于原文方面。我国近现代文学翻译，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从来都有各走极端的两派。一派是“意译派”，这一派强调译文流畅，强调“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强调翻译的“灵活性”。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派占统治地位。因此，英文成语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被“汉化”为“一箭双雕”，而无人把它照原文译为“一石二鸟”。另一派为“直译派”，主张照原文直译，以忠于原文。鲁迅是赞成直译的，但鲁迅的有些译文（如《死魂灵》）确实比较艰深，不容易懂。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些译文不忠于原文，质量不高，除去“意译”这一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当时社会不安定，译者生活困苦，赶任务；有些译者外文水平有限，加上缺少工具书，译文错误较多；无审校制度，当时只有译者，而无译文审稿人，因而无法把关等。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文学翻译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之所以如此，其一，是有一些老一代的优秀翻译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依

然健在(如傅雷、曹靖华、罗念生、汝龙、楚图南、李健吾、查良铮、萧乾(于1999年去世)),或至今仍健在(如水夫、季羨林、杨宪益、戈宝权、朱维基等人),他们在新社会的优越条件下继续潜心翻译,精益求精,为新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二,是大批新社会培养的中青年翻译家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有不少大学的外文系(后来则改名为外语系)都办得不错,尤其是一些名牌大学,确实培养出一批不仅外语好而且文学和中文功底深厚的译者,如董衡巽、李文俊、飞白、吕同六、吴岩、草婴、余振等,这些人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我国译坛。其三,是出版社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审稿制度,把关较严,经常聘有专人负责审稿,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可以这样说,和台湾、香港相比,祖国大陆的翻译队伍力量要强得多,不单是人多势众,更重要的是译文质量总的来说比港台要高很多。我曾遇见一外籍华裔女作家,她说她的英文小说在台湾翻译出版,质量很差,原因是出版商抢时间,由一位译者找了一批研究生,每人译一部分,大家赶任务,匆匆凑合成书。而同一本小说在大陆出版,翻译质量高得多,原作者十分满意。这不是个别事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作为读者,我们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取得的伟大成绩而自豪。

三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近年来的“低谷”?前面已谈过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客观原因在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倒是主观原因,即一些年轻译者水平不高,加上粗制滥造等,却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年来某些文学翻译固然水平不高,但同样严重者则是社会上一般翻译(如商品之外语说明、外语导游词、名片、招牌、广告等)之严重滑坡,错误百出。有的公司某部门的部长、市县一级机关的部长名片,其英文职务竟是赫赫的Minister,成了国家中央一级的“部长”!有一家“××物业公司”,门口悬挂一块制作精美的黄铜招牌,公司译名却为Material Business Company。这位译者知识面太窄,不知汉语之“物业”即“房地产”之意,因此应译为Real Estate Company。然则既然不懂,为何不先请教一下别人?起码也要弄清“物业”的含义再译。怎么能生吞活剥地硬把“物业”译成中国人、外国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Material Business(物质的商业)呢?另有一种反常现象,是我国不少地方的飞机场、火车站和高级宾馆的“问讯处”、“问讯服务”招牌,英文并未写错,是Information,完全正确,而中文却一律错写成“问询处”、“问询服务”。汉语里提问题叫“询问”,不叫“问询”,而查询人名,地名,火车或飞机的车次、航班及时间等资料,则叫做“问

讯”，与英语Information完全一致。如何能把“问讯”误写为“问询”呢？真正令我震撼的还不仅是这一错误本身，而是其普遍性，即国内各地这一招牌的中文，十之八九均写错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一现象，殊堪忧虑。事实上，这种错误已超出翻译范围，原因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中文太差的缘故。

“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有些译者水平不高？原因当然很多，例如“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经商“大潮”冲击，学生不愿努力学习、成绩下降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不足，文化修养差，基础知识欠缺，而这一问题追本溯源，又牵涉到大学外语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培养目标有问题。

我国高校培养外国语言专业的系，原先(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叫“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为“外文系”。50年代后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各有关院系组织人力大张挞伐，批判外文系的所谓“文学道路”，并把系名改为“外语系”。这“外语”和“外文”两者间一字之差，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文学课基本上全被砍掉了，而培养目标也改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外语人才”。我们知道，语言只是工具。严格地说，它不能独立为一个学科，最好的语言就是文学语言，语言离不开文学，离开了它便成为只有一条腿的“跛脚鸭子”。学古汉语，单讲“之乎者也”，不念《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散文，可以吗？学现代汉语，不念鲁迅、曹禺、赵树理等人的文学杂文、小说戏剧，能行吗？这本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我们高校外语系多年来却只讲外语，不及外文，致使长期不具备必要的外国文学或文化背景知识，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家，除了熟悉外语和中文之外，还必须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学、文化背景知识，不如此他便不能胜任。即使一个普通的口译员，与外宾交谈时，就算他外语口语十分流畅，但如果他不懂对方国家的文学、文化以及风土人情，也没有足够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他除了与外宾谈日常生活、旅游、天气等之外，还能深入谈什么呢？近年来，有些报纸翻译外电，时有译错之处，如把英文second lieutenant(少尉)译成“二级准尉”。译者根本不知道英语里“准尉”有两个词，一是sub-lieutenant，另一个是美国军队的warrant officer(简称W/O)。这位译者如能多看一些外文小说(特别是战争小说)，或者多读点外文的报刊，便不至于闹此笑话。而且，即使从常识来判断，全世界各国“准尉”军衔只有一种，即“准尉”，又何来“二级准尉”呢？

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不但外语好而且还要思想品质好，有一定的外国文学修养和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有

教养，能够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在专业上做出贡献的人。我国外国文学界前辈、比较文学先驱、国学权威兼《红楼梦》专家吴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就提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目标是“博雅之士”。这一名称我们可能听不惯，顾名思义，“博”指知识面要广，“雅”指要有较高的文化和品德素养，“士”指的是知识分子。我们今天当然不必用这一过于陈旧的词语，但必须明确，只培养单纯的“外语”人才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同时培养知识广博、中外文化背景知识较为丰富、政治思想好而且会做人的全面的知识分子。当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后来成为“大师级”、“国宝级”的学者有钱钟书，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有罗念生、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等人。这样的学者，我们今天的北京大学能否培养出来呢？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个统计，该校前40年共培养出全国、全世界知名学者(包括闻一多、朱自清、李健吾、梁思成、王力等)43人，而后40年只培养了3名。这一鲜明对比，难道不值得每一个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深思吗？

学术和知识水平滑坡是个严重问题，再加上粗制滥造、工作不负责任，就更严重了。这几年，一些出版社竞相重译外国文学古典名著。我并非一概反对重译。可是，重译按理说应该比已出版的译文好，或至少水平差不多，而又有自己的特点。英国18世纪古典主义大师、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以英雄对句形式用6年时间译成了诗体的荷马两大史诗，这以后英、美两国又多次有人重译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包括20世纪40年代末李悠(E. V. Rieu)用散文翻译出版的“企鹅丛书”版。我国不少的莎士比亚戏剧都有不同译本。由此可见，只要有水平，有自己的特色，重译不是坏事，译书也应该百花齐放。但是，像《红与黑》一书，至今竟有十三四种译本，有此必要吗？其中，最近出的两三种译本，译者只是“誉文公”，或曰“文抄公”，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杂乱无章，令人不忍卒读。这是一种很坏的风气，译者和出版社都有责任。

粗制滥造中更常见的是译者水平太低，错误百出。有一位学者检查由两位译者分别翻译的同一部美国中篇小说，译文只两万多字，这两位译者却译错了100多处。还有一位译者，把英语里很平常的一个词ironically(原意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译成“斩钉截铁地”。还有更离谱的，某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一部当代美国畅销书，竟将讲英语的国家里连幼儿都懂得的一句话“How do you do?”译成“你干得怎么样？”类似例子尚多，恕不一一列举。

由于知识面窄，或文化素养低，有的人连外文人名、地名的简单译

音都译不好。美国Iowa州的I应该读长音，因而应译为“爱阿华”，但我们的一位“权威”译者把它误为短音，便错译成“依阿华”州。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一律称之为“爱荷华”州，便译对了，只是我们的译名已定，很难再改。非洲的Mozambique国名本不难译，可是不知何故，也不知是报社或外事部门哪位译者不谙译名惯例，不懂得数目字、人体部位的“鼻”和动词“给”都不能用在国家译名上，误译为“莫三鼻给”。此名一出，使人感到译得滑稽可笑，不伦不类，但在我国报刊广播中仍然用了许多年，后来才改译为“莫桑比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不事行，可见译名不是小事，必须注意。

附带说一句，关于科技翻译，《光明日报》（1996年3月25日）曾有一短文，提到我国科技翻译“目前已跌至低谷，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这一情况确实令人担心，我把它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四

上面我提出了当前我国翻译界存在的问题，虽然只是主要谈了文学翻译，但我相信在学术翻译、科技翻译和口译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情况。

怎么办？出路何在？

一言以蔽之，首先是求其在我，提高质量。这“质量”有两个含义，一是提高翻译者的素质，二是提高译文的质量。这两者是相关的，而关键则在前者。“五四”以后，我国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他们基本上都是学者、作家而兼翻译家，除了有学问、中文功底好以外，大都精通一两门甚至三门外语。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徐志摩、丰子恺、冰心、周作人、伍光建、楼适夷等人。上述这些人，都可以算硕学大儒，“文武双全”。即以古典文学修养一项而言，他们无一不在古典文学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在学术上，他们都称得起“国之精英”（其中，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是另一回事，与学术无关）。这些人不论做学问，搞创作或作评论，还是搞翻译，工作均极端认真，其翻译质量当然很高。像这样学问高超、知识渊博、中外文水平皆高而且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今天能有多少？我们今天的中年人，不少人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念书很少，后来有人幸而进了大学，也没受过严格的语文和文化教育，成为“工农兵学员”。无庸讳言，今天确有一批中年国画家不懂旧体诗，有少数中年书法家写错别字，至于报刊上的文章因语句不通、乱用成语、错别字连篇、历史地理知识贫乏而经常闹笑话者，便更多了。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基础没打好。这样的译者能不出大错